

牛津、剑桥的传统

厦门大学 连淑能

导师制是牛津和剑桥办学的核心环节,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的主要方式,体现一对一“承包责任制”。教授职称通过广告招引公开平等竞争,择优聘任。教师工作量靠“君子协定”。

应 牛津大学语言学与语文学研究中心、汉学研究所和剑桥大学语言学系等两所大学三个单位的邀请,我在牛大作了为期一年的“汉英语言与中西文化”跨学科研究,涉及语言学、文化学、英语与英美文化、西方文化学、英美的汉学研究、文化与社会人类学、社会语言学、对比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等多门学科,因而与牛大的许多学科教授学者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,与合作导师每周研讨2小时,平均每周听课或参加讲座4~6小时;大量阅读书刊,充分利用牛津电脑网络、8个有关的图书馆和许多书店,搜集有关资料,写出专著纲要和论文两篇,选编了较为完整的参考书目,购买了部分图书,为回国后指导博士生作了充分准备,完成了我的研究计划,并考察了牛津和剑桥的办学思想、传统和经验,写出了考察报告。自1998年4月起,在继续与牛津大学保持关系的同时,我又与剑桥大学的许多教授学者开展了学术交流。一年来,我已与两所大学的一些著名学者建立了关系,争取今后邀请他们来我校讲学,进一步扩大交流渠道。

在世界一流的牛津和剑桥研究一年之后,我深有感触: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方面太多了。牛津和剑桥的办学思想是:“探测、挖掘和发展学生的潜在能力,激励个人的创造精神”,注重综合素质,培养融会贯通、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。

在此办学精神指导下,牛津和剑桥800多年来保持并发扬其卓越传统,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政治家、哲学家、文学家、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,产生了50多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(英获此奖按人口计居世界首位,总数仅次于美国)、40多位英国首相。现任英国首相布莱尔、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加

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挪威等国的总统、总理、国王、总督等政治家,罗素(Russell)、培根(Bacon)等哲学家,雪莱(Shelley)、拜伦(Byron)、王尔德(Oscar Wilde)、密尔顿(Milton)等文学家,亚当·史密斯(Adam Smith)等经济学家,牛顿(Newton)、达尔文(Darwin)、弗来明(Fleming)等科学家以及中国著名学者严复、林语堂、钱钟书、吕叔湘、徐志摩、肖乾、许地山、杨宪益、张道真等著名学者都是牛津和剑桥的校友。牛津和剑桥两大学出版社的词典、百科全书、专著和教科书在世界上常被视为经典。有趣的是,始于牛津的大学教育在西方英语国家代代相传,产生了世界名校的“父子—孙”关系:牛津—剑桥—哈佛—耶鲁。

我们要创一流,就要学习世界一流名校的优良传统,引进一些合理的、适合我国国情的做法。考察了牛津和剑桥,觉得令人深思之处太多了,以下仅举两例。

一、导师制

导师制是牛津和剑桥办学的核心环节,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的主要方式,体现一对一“承包责任制”,有利于因材施教、精耕细作,有助于探测、挖掘和发展学生的潜力,关心、引导和鼓励学生的学业,从而促使学生独立钻研、开拓创新。

牛大教师目前1366人,学生15500人,平均每位教师指导11个学生。每位导师每周辅导学生一次,每次每个学生一小时,共11小时,另外每周上课2小时,总共13小时,绝不比课堂教学轻松。辅导按课程表进行:学生汇报,导师评议,师生讨论,导师指点、布置书目和论文,关心学生的思想和生活。这需要导师平时的学术积累,辅导前细心审阅学

生论文,还需要学生大量阅读和独立思考。如果辅导质量差,以后无人请你当导师,聘任就成问题。这是师生“劳力密集”的教学方式,也是教师工作量的主要所在。

牛大不计算工作量,只在聘任合同里写明每学年每位教师上课36小时(每周1.5小时,每学期8周,每学年3学期,上课共24周;余为假期),每位学生平均每周上课8小时,全学年约192小时。教师辅导学生数由学科委员会根据教师专长和学生报名而商定。教授职称通过广告招引公开平等竞争,择优聘任。教师工作量靠“君子协定”,因为知识传授主要靠职业道德、觉悟良知、雄心抱负、内外动力和师生合作,而不用时数、课数、人数等机械数量把师生捆死。课程设置由校方规定,学生可自由听课。

我们的本科生到了最后一学年才有论文导师,研究生导师制也不健全。工作量计算法引导教师注重教学时数、课数、人数,多开课、开大课、开长课才能填满教师工作量,但同时也把学生的课程表排满(难怪教室不够用)。这样一来,教师能有多少时间个人辅导,学生能有多少时间独立钻研?

我们的传统教育把课堂教学当作主要环节,中小学如此,大学也如此;过去长期如此,现在也如此。不少教师照本宣科,不讲效果,自我感觉良好,殊不知学生已快罢课了。牛津和剑桥的教师宁可精讲多议,画龙点睛,把参考书介绍给学生去阅读,也不搞照本宣科、讲义保密,更不愿意在漫长的课时内重复那些课本上已有的、学生也听厌的内容。

在做学问的十大环节(听、说、议、读、写、译、记、做、用、创)中,牛津和剑桥乃至整个西方大学教育传统(这里我主要指文科),都十分注重“议”、“读”、“写”、“创”(学外文要“听、说、读、写、译”五会,还要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),其中以“写”来带动其他环节,并体现成绩和成果。从入学、考试、毕业、获得学位、职称,直至成为专家学者,都离不开有创见的论文或著作。“写”这一环节,除了上课之外,主要靠大量阅读和导师辅导(包括讨论、评审)来促进。

我们的传统教育注重“听”、“读”和“记”,以迎接“考”。教师满堂填灌,学生紧抱课本,死记硬背、被动挨考,无暇博览群书、独立钻研,更难产生创见、创新。这一套在中小学还马虎可以,但到大学就落后了。如今我们的学生(尤其本科生)写毕业论文十分艰难,到了毕业前,人人忙于找职业,抄袭移植、七拼八凑来应付论文,几乎成风。写有创见的论文是我们的弱项,也是与一流大学的重要差距。

牛津和剑桥的导师制是世界闻名的,也是独特的。要完全照搬其做法是不可能的,但适当减少课堂教学时数,

把腾出来的工作量用于个人辅导,也让师生有足够的时间去钻研,并用措施保证其执行,修改工作量计算法,看来是可取的。

二、资源共享

牛津和剑桥的资源共享传统很值得学习。这里资源共享的观念是:资源包括“硬件”(看得见的东西)和“软件”(看不见的东西)。“硬件”如:图书资料、实验设备、电脑系统、办公设施和其他资产;“软件”如:师资力量(全校共享,包括听课、辅导、咨询、请教,可跨系、跨学科)、学科知识、信息、讲座(每周至少一次,也是教学)等。共享范围:全校、跨校、跨学科、跨国。

以图书馆为例。牛津和剑桥的图书馆是世界闻名的,不仅因其藏书多(牛津共有100多个图书馆,最大的Bodleian图书馆藏书600多万册),而且因其优质服务:Bodleian属“参考书图书馆”,全部藏书不可外借,只可在其阅览室阅读(因此阅览室多而宽敞),开放时间长(9:00~22:00,周末、假期不关门),读者只要从图书馆电脑网络查出书号、书名和作者,找书、取书、还书、复印等事务全由工作人员代劳,因而可充分利用时间,随时读到所需的任何书刊,效率特别高。其他各分馆则全部开架、出借,复印机到处都有,可自助服务。读者只要一卡在手,就可在全校100多个图书馆畅通无阻,必要时,还可向其他大学借书。剑桥图书馆也开架出借。牛津和剑桥的图书资料和管理方法互为补充,形成世界上实力雄厚的图书宝库。图书采编由专业委员会决定,确保其经费各科共享,并优先采购到最需要的书刊。

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城里,人人为一字忙碌:书(理工科还要做实验)。写书(学者云集)一出书(世界一流出版社)一卖书(牛津有100多家书店,包括世界一流的Blackwell)一藏书(牛津有100多个图书馆,包括世界一流的Bodleian)一读书(师生博览群书成风)一教书(辅导+上课),真是书的世界。

我们办学经费不足,资源本来就很有限,加上各自为政,互不分享,办学就更困难了。图书馆的兴旺发达是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。我们应该争取外界捐赠(牛津的Bodleian就是Bodley捐资的),增加图书设备和阅览室,配备图书馆学专业人员和组织管理人员到国外一流大学考察,如此等等,大大加强图书馆实力,为创一流提供优质服务。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罗素(B. Russell,剑桥校友)曾在其著作里指出:“中国的大学不会缺人才,而缺图书和资金。”此话令人深思。